

元好问与戴复古论诗绝句比较论

胡传志

内容提要 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与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是论诗诗史上的代表作，元诗写于前，戴诗作于后。两者相差十六年，都是与其他诗人切磋诗艺的产物，皆具实用性。内容上，元年轻气盛，重在批评他人，告诫自己；戴年近古稀，意在自述体会，教导他人。对论诗绝句的体制局限，戴诗无甚作为，元诗则成功发掘论诗绝句的体制潜能，从而超越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，成为后代广泛效仿的对象。

关键词 元好问 《论诗三十首》 戴复古 《论诗十绝》 比较

论诗绝句自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首开其端之后，继作者代不乏人，但真正出现里程碑式的作品，是在三四百年之后的宋金双方。在金有元好问，以《论诗三十首》为代表；在宋则有戴复古，以《论诗十绝》为代表。二者略有先后，形成呼应态势，共同促进了论诗绝句的发展。学界对《论诗三十首》的研究由来已久，清人查慎行《初白庵诗评》、翁方纲《石洲诗话》、宗廷辅《古今论诗绝句》等各有所论，当代学者著述更多，如郭绍虞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》、刘泽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》、港台学者王韶生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笺释》、陈湛铨《元好问论诗绝句讲疏》、邓昭祺《元好问论诗绝句笺证》、何三本《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笺证》、方满锦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研究》都是相关专著。与此不同，学界对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的研究主要见于各种批评史、诗论史，重在研究其诗学思想，对其作专题研究的论文寥寥无几，专题研究的著作尚未出现。但是，自郭绍虞先生以来，凡谈及论诗诗演变者，就常将二者联系起来，有所比较，但又往往语焉不详，大都沿袭郭绍虞先生的观点，未能作进一步细致的分析。本文将努力通过比较，揭示两组诗在写作时间、主旨内容以及在发挥绝句体制功能方面的异同和得失。

一 创作先后与实用动机

受正统观的潜在影响，人们在叙述论诗绝句的发展史时，通常由唐至宋再至金，习惯于先谈杜甫，次谈戴复古，最后谈元好问，仿佛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写作在前，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写作在后，这其实是个错觉。

元好问在《论诗三十首》题下标明写作时间和地点：“丁丑岁三乡作。”丁丑为金兴定元年（1217），当时元好问因避战乱逃至福昌县三乡镇。虽然有学者根据末首“老来留得诗千首”之句，怀疑组诗写于晚年，但证据不力，无法否定其自注的可靠性。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，原题作《昭武太守王子文，日与李贾、严羽共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，因有论诗十绝。子文见之，谓无甚高论，亦可作诗家小学须知》。一般批评史类著作不太关注其写作年代，其实，其写作年代并不难考知。题中的王子文为王埜，绍定五年（1232）十一月后任昭武太守，戴复古在此前后，来到昭武，次年秋天即离开昭武，在昭武期间，戴复古与王野、严羽等人多有交游，戴复古有《祝二严》诗，严羽有《送戴式之归天台歌》诗。所以，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应作于南宋绍定六年（1233）^①。两相比照，即可见《论诗三十首》写作时间比《论

^① 张继定《严羽和戴复古身世行迹诸问题考》，《南昌大学学报》2001年第4期。

诗十绝》早十六年左右。有些学者习而未察，误以为戴作在元作之前，如林东海《论诗诗论》曰：“到了南宋，江湖派诗人戴复古才有意于仿杜，用绝句组诗专论诗歌，作《论诗十绝》，侧重于论述诗歌原理；其后金源又有元好问加以鼓吹，作《论诗三十首》，侧重于评论历代作家。”^①邓新华《论诗诗：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》认为：“论诗诗在由南宋向金、元的发展过程中，出现了两个对论诗诗有突破性贡献的人物，这就是戴复古和元好问。戴复古有《论诗十绝》……而最终克服戴复古略嫌散漫之弊端，以明确的目的、严肃的态度、辩证的眼光来以诗论诗，从而将绝句体论诗组诗发展到更加完美境界的则是金代的元好问。”^②这些都是受正统论叙述思路误导所造成的时间倒置。澄清这一关节之后，原先那些属于戴复古名下的开创之功，如“首次在题目上出现‘论诗’的”论诗诗^③，就应归于元好问，元好问较之戴复古，可谓占得先机。

《论诗三十首》完成后，是否及时传入南宋？理论上应有可行性。当时南北的交流并未完全阻断，可现存文献中没有任何传入南宋的征兆。不仅如此，《论诗三十首》在北方也未见记载，未见出任何反响，不得不让人怀疑元好问当时并未将之及时公开。可以肯定，戴复古没有看到这一组诗，《论诗十绝》是其直接上承杜甫和其他宋人的独立创作，中间没有受到《论诗三十首》的影响。这实在是个大遗憾，否则《论诗十绝》或许是另一番面貌。

从生成背景来看，元、戴这两组论诗绝句都是诗人切磋诗艺的产物。元好问创作《论诗三十首》时，尽管处于避乱期间，偏处三乡，但那里可谓是乱世中的一片诗歌绿洲。赵元、李汾、辛愿、刘昂霄、英禅师等一批优秀诗人聚集其地，经常举行诗会，如他们游览三乡光武庙，元好问、刘昂霄、辛愿、魏邦彦等六人相继作诗，元好问《秋日载酒光武庙》、刘昂霄《中秋日同辛敬之、魏邦彦、马伯善、麻信之、元裕之燕集三乡光武庙，诸君有诗昂霄亦继作》二诗流传至今。在集体酬唱之时，他们定然有所思考，互相促进，共同提高。元好问说英禅师因与辛愿、赵元等人交往，而“诗道益进”^④。元好问自己也不例外。虽然现存文献中没有他与其他诗人直接探讨《论诗三十首》相关问题的记载，但可以肯定《论诗三十首》的创作与此大背景相关。当时元好问二十八岁，尚未考中进士，未进入主流诗坛。为此他很苦恼，就在这一年，他多次感叹：“学诗二十年，钝笔死不神。乞灵白少傅，佳句傥能新。”（《龙门杂诗》其二）“我诗有凡骨，欲换无金丹。”（《寄英禅师》）可见他与其他诗人经常交流诗艺。戴复古创作《论诗十绝》，正如其原题所示，是与昭武太守王桢（王子文）、李贾（李友山）、严羽等研习前人诗歌有感所作。王桢爱好诗歌，昭武（今福建邵武）也是一方诗人乐土，戴复古绍定五年去昭武的主要目的是访友论诗^⑤，如其诗题所云“过昭武访李友山诗社诸人”、“李友山诸丈甚喜得朋，留连日久”。戴复古与王桢等人诗歌往还，称颂王桢“风流太守诗无敌，有暇登临共唱酬”（《题邵武熙春台呈王子文使君》）。其时戴复古六十六岁，是其中地位最高、年资最长的诗人，《论诗十绝》显然是他与其他年轻诗友切磋诗艺的产物。可见，不论年龄长幼，也不论地处南北，爱诗之人都会谈诗论艺，促进诗歌创作和批评。

正因为两组论诗绝句出于探讨诗艺的背景，所以都具有突出的实用性。只是元、戴二人创作论诗绝句时的年龄、地位不同，其实用性的指向也有较大差异。元好问作《论诗三十首》与此前所编《诗

① 林东海《论诗诗论》，《文学评论》1984年第1期。

② 邓新华《论诗诗：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》，《武汉大学学报》2007年第1期。台湾亦有学者持此论。如何三本《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笺证》：“若以论诗绝句之起源或发展之先后为序，则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应为论诗绝句之滥觞；次为南宋戴石屏《论诗绝句十首》，其次为金元好问《论诗绝句三十首》。”（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》第7卷第3期，1963年）

③ 张伯伟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》，中华书局2002年版，第413页。

④ 元好问撰、姚奠中主编、李正民增订《元好问全集》卷三七《木庵诗集序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773页。

⑤ 张继定《严羽和戴复古身世行迹诸问题考》。

文自警》、《锦机》等书大体相同，意在通过品评前人创作得失，来提高自己的诗歌水平，具有“自警”之意。如论秦观诗歌，“拈出退之山石句，始知渠是女郎诗”，完全复述王中立之语，王中立之语又见《诗文自警》。《论诗三十首》最后一首诗云：“撼树蚍蜉自觉狂，书生技痒爱论量。老来留得诗千首，留与谁人较短长。”一方面有所自谦，承认写作组诗、评点前代名家，有些书生技痒之类的轻狂，一方面信心不足，担忧自己的诗作被后人随意评鹭。或许正因此顾忌，元好问才未公开该组诗。而戴复古其时已经是名满江湖的诗人，相当自信，自称其诗是“黄金作纸珠排字，未必时人不喜看”（《戏题诗稿》），如此自负，写作《论诗十绝》的目的当然不在自警，而是就诗歌创作的相关方面，发表自己的见解，以教导时人和后生。所以，即使这一组诗不被昭武太守王埜看好，认为“无甚高论”，戴复古仍然不为所动，乐意将之公开，将之视为实用性、指导性很强的“诗家小学须知”。这一“小学须知”显然不是诗人自己创作的内在需求，而是告诫他人如何作诗。

二 批评论与经验谈

郭绍虞先生曾比较元好问、戴复古这两组论诗绝句，认为都源自少陵，各得一体，“戴氏所作，重在阐述原理；元氏所作，重在衡量作家。这正开了后来论诗绝句的两大支派”^①。此论在分别戴、元诗论时，抬高了戴复古的地位，为学界广泛认同。只有张伯伟敏锐地指出，将“戴复古说成是后世论诗绝句的一派之祖，并无确凿可靠的依据”^②，《论诗三十首》虽“偏于论作家，而在评论作家中，又贯穿了其诗歌理论”，而“《论诗十绝》虽然偏重理论，但却没有一个诗学宗旨贯穿其间”^③。而这两点差异，正是造成元、戴诗歌高下的决定性因素。

元好问其时已经初露锋芒，所作《箕山》、《琴台》等诗受到前辈诗人赵秉文的誉扬，树立起进军诗坛的决心。为此，他必须总结前人得失，思考当下诗坛的弊端，引以为戒。他以三十首的篇幅，纵论古今诗坛，其中虽然多数属于作家论，但作家论未必就是他论诗的重点。《论诗三十首》大抵可以分为三类：第一类不涉及具体作家，纯粹探讨创作理论，如开宗明义的第一首：“汉谣魏什久纷纭，正体无人与细论。谁是诗中疏凿手，暂教泾渭各清浑？”继承杜诗“别裁伪体”的精神，以正体为标的，具有鲜明的疏凿意旨，可谓立意高远。第十一首：“眼处心生句自神，暗中摸索总非真。画图临出秦川景，亲到长安有几人？”强调亲身经历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。第二十一首：“窘步相仍死不前，唱酬无复见前贤。纵横正有凌云笔，俯仰随人亦可怜。”批评次韵唱酬这种创作方式。第二类，以阐明其诗歌观念为主导，以作家论为辅证，重点仍然在创作论。如第六首：“心画心声总失真，文章宁复见为人？高情千古闲居赋，争信安仁拜路尘？”其重点显然不在贬斥潘岳，而是以潘岳为例，论人品与文品的关系，证明文章不能见为人的观点。第九首：“斗靡夸多费览观，陆文犹恨冗于潘。心声只要传心了，布谷澜翻可是难？”其重点在于批评“斗靡夸多”，陆机、潘岳只是他信手拈来的例子罢了。第十四首：“出处殊途听所安，山林何得贱衣冠？华歆一掷金随重，大是渠侬被眼漫。”反对隐居山林之人以道德优势自居，鄙视衣冠之士。华歆掷金之事亦不过为其反面例证而已。第十七首：“切响浮声发巧深，研磨虽苦果何心？浪翁水乐无宫徵，自是云山韶濩音。”反对过分研磨声律，提倡自然音韵，后两句引元稹《水乐记》及《欽乃曲》作为前两句观点的佐证。第三类，虽是相对单纯的作家论，但亦体现其诗学主张。如第八首：“沈宋横驰翰墨场，风流初不废齐梁。论功若准平吴例，合著黄金铸子昂。”在初唐诗坛的背景下，评价沈佺期、宋之问、陈子昂，重点肯定陈子昂的革新之功。第十八首：“东野穷愁死不休，高天厚地一诗囚。江山万古潮阳笔，合在元龙百尺楼。”将孟郊与韩愈对比，不仅见出其高下之别，还

① 郭绍虞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（上卷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296页。

② 张伯伟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》，第414页。

③ 张伯伟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》，第418页。

表现出对孟郊渲染穷愁主题的不满。在上述三类诗中，第一类与作家论基本无关，第二类涉及到作家论，但作家论只是其创作论的素材，第三类为作家论，约占《论诗三十首》一半比例，也可以说是通过作家论来阐明其诗学宗旨。因此，《论诗三十首》仍然偏重于理论。具体论述中，有褒有贬，贬多于褒，换言之，《论诗三十首》以批评论为主。

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确实如郭绍虞先生所说，“重在阐述原理”。十首诗中，大抵可以分为两类：第一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有关作家，是他“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”引发的读后感，重点是借助作家论来表达其诗学见解。如第一首：“文章随世作低昂，变尽风骚到晚唐。举世吟哦推李杜，时人不识有陈黄。”承认诗歌应该随时代而变迁，李杜、陈黄是唐宋两代诗人的代表，认为陈黄虽不及李杜，也不该被遗忘。第六首：“飘零忧国杜陵老，感寓伤时陈子昂。近日不闻秋鹤唳，乱蝉无数噪斜阳。”前两句是作家论，推崇杜甫、陈子昂忧国伤时的情怀。后两句指向现实，感叹当下缺少关注国事民瘼的诗歌。第二首：“古今胸次浩江河，才比诸公十倍过。时把文章供戏谑，不知此体误人多。”虽然没有明确所指对象，但应该指苏轼等人，重点批评诗中的戏谑之风。这类诗歌是作家论和创作论的结合。第二类是其他七首诗歌，与作家论基本无关。这些诗歌与其说是阐述原理，不如说是介绍其创作经验，特别是创作技巧方面的体会，属于“诗家小学须知”的范围。如第三首：“曾向吟边问古人，诗家气象贵雄浑。雕镌太过伤于巧，朴拙唯宜怕近村。”谈的是自己追求雄浑、反对过分雕琢工巧、又不愿流于村俗拙劣的体会。其他如“须教自我胸中出，切忌随人脚后行”、“陶写性情为我事，留连光景等儿嬉”，都是第一人称、指教他人的口吻。最后四首也是如此：

欲参诗律似参禅，妙趣不由文字传。个里稍关心有悟，发为言句自超然。

诗本无形在窈冥，网罗天地运吟情。有时忽得惊人句，费尽心机做不成。

作诗不与作文比，以韵成章怕韵虚。押得韵来如砥柱，动移不得见工夫。

草就篇章只等闲，作诗容易改诗难。玉经雕琢方成器，句要丰腴字要安。

这些基本上都是他的创作心得。譬如他作诗不计迟速，有时获得一佳句，经年才得以成篇。据瞿佑《归田诗话》卷中《戴石屏奇对》载，他曾见夕阳照映群山，有“夕阳山外山”之句，最初以“尘世梦中梦”相对，觉得不甚满意，后来村行途中，触景而发，忽得“春水渡傍渡”一句，恰好与“夕阳山外山”相对。这一例子可以当作“有时忽得惊人句，费尽心机做不成”两句的注脚。

由上可见，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重在批评他人，告诫自己；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重在自述体会，教导他人。元好问年轻气盛，既敢于褒贬前代名家，蚍蜉撼树，又能别具只眼，颇具卓见，显示出高于时辈也高于戴复古的实力。戴复古年近古稀，好为人师，喜欢向人介绍经验，絮叨琐细，遗憾的是，他虽然秀出东南一方，自负颇高，实未能跻身一流诗人之列，终身成就远不及元好问，其手眼亦远不及元好问。所以，他的创作经验难免流于寻常浅显，新意有限，当即被年轻的地方官王埜指为“无甚高论”，其《论诗十绝》写在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之后，却后来居下，不禁令人惋惜。清人宗廷辅《古今论诗绝句》称扬戴作：“石屏一生得力，略尽此十绝中。即有宋一代诗学，亦略包此十绝中。其语直截痛快，度尽初学金针。”肆意拔高，有失允当，远非事实。

三 体制潜能的发掘与停滞

就论诗而言，学界普遍承认，元好问对后世的影响远超过戴复古，王士禛、袁枚等名家都有仿作，而在郭绍虞等先生所编的《万首论诗绝句》中，却不见模仿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的作品。有学者指出：“在论诗绝句发展史上，元好问创造了杜甫以后的真正辉煌，标志着论诗绝句地位的确立。”^①元好问《论

^① 高利华《论诗绝句及其文化反响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03年第1期。

诗三十首》何以获得如此高的地位?除了在规模、内容上胜过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之外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元好问成功发掘了论诗绝句的体制潜能。

论诗绝句是诗歌理论与诗歌艺术的联姻,其本质仍然是诗歌,而非理论著述。绝句篇幅短小,历来以即景抒情见长,以之阐发理论,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便。杜甫当年“戏为”之举,本有探索尝试、偶尔为之之意。即使以他出神入化的大手笔,也未能把论诗绝句写得像散文那样的“曲折达意”,不能围绕中心自如地“畅发议论”,导致其诗歧解纷纷^①。杜甫开创了论诗绝句的体制,却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体制内含的矛盾。杜甫之后的继作者,一来不太重视论诗绝句(特别是组诗)的创作,二来有限的论诗绝句没有作出值得称道的开拓。名篇如王安石《题张司业诗》:“苏州司业诗名老,乐府皆言妙入神。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。”直接议论,不见得有多少技巧。苏轼《戏徐凝瀑布诗》:“帝遣银河一派垂,古来惟有谪仙词。飞流溅沫知多少,不与徐凝洗恶诗。”形象生动,却戏谑有余,论说不足。吴可《学诗诗》三首,均以“学诗浑似学参禅”开篇,介于谈诗说禅之间,偏于抽象枯燥。总之,论诗绝句由唐至宋几百年来没有大发展。元好问恰好在理论阐发与诗歌艺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,成功地克服体制局限,发掘体制潜能,而戴复古则没有做到这一点。

如上文所述,在内容的选择上,《论诗三十首》并非纯谈诗学原理,大多通过具体的作家、作品的品评,来以小见大,以少见多,由具体见一般,从而有效地越过篇幅短小的局限,避免空谈理论的弊端。兹举第三首为例:“邺下风流在晋多,壮怀尤见缺壶歌。风云若恨张华少,温李新声奈尔何?”中心内容是不赞成钟嵘关于张华“儿女情多,风云气少”的观点,认为晋诗尚存建安之风。前两句举王敦击缺唾壶、吟诵曹操诗歌为例,证明邺下风流在晋代的传承,后两句举出唐代的温李新声,反驳钟嵘之说,反映出元好问崇尚壮美的旨趣,以及博通诗史的眼光。可谓事例具体,立论轻巧。而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的内容,或偏向于宏观抽象,如第四首:“意匠如神变化生,笔端有力任纵横。须教自我胸中出,切忌随人脚后行。”理论有余,感性不足;或流于琐屑短钉,如上引“作诗不与作文比”、“草就篇章只等闲”两首,关于押韵、改诗之类论述,理论性不足。两种类型都没有把握住论诗绝句的体制特点。

除内容之外,元好问还创造性地采取其他一些技巧来克服篇幅短小的局限,以期扩大绝句的容量^②。他最爱用的技巧有两个,一是对比手法。对比所形成的反差,成为有张力的空间,具有丰富的内涵暗示,能产生意在言外的效果。如上引:“风云若恨张华少,温李新声奈尔何?”“高情千古闲居赋,争信安仁拜路尘?”在对比中启人深思,无形中拉大了上下句的空间。再如第二十九首:“池塘春草谢家春,万古千秋五字新。传语闭门陈正字,可怜无补费精神。”将谢灵运的清新自然与陈师道的闭门觅句相对比,引起读者关于二人不同创作方式、不同诗歌境界的联想。另一技巧是设问。据统计,《论诗三十首》中有十七首诗用了十九例疑问句。其中可分为一般疑问句和反问句两种。一般疑问句如第一首:“谁是诗中疏凿手,暂教泾渭各清浑?”可以理解为作者以疏凿手自许,也可以理解为对“诗中疏凿手”的一种期待。第二十七首:“诗学金陵犹有说,竟将何罪废欧梅?”后人何为“废欧梅”,作者自己也未必清楚,却发人深思。反问句意思与否定句相同,却多出一层言外的空间,更能令人回味。如其五评价阮籍:“纵横诗笔见高情,何物能浇块垒平?”针对“阮籍胸中块垒,故须酒浇之”(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)的说法,反问“何物能浇块垒平”,促人思考:酒不能消其块垒,还有什么可以消其块垒?再如其十九评价陆龟蒙:“万古幽人在涧阿,百年孤愤竟如何?”陆龟蒙一辈子孤愤,其结局如何?必须联系陆氏的生平遭际等其他资料才能给出答案。元好问正是通过对比、设问等技巧克服绝句容量不足的局限。反观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,在扩充绝句内涵方面,几乎没有作为。十首诗中,仅第六首将杜甫、

① 郭绍虞《杜甫〈戏为六绝句〉集解 元好问〈论诗三十首〉小笺》后记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,第87页。

② 关于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文学技巧的分析,参见方锦满《元好问〈论诗三十首〉的文学性》,胡传志主编《中国诗学研究》第3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。

陈子昂诗与当下的蝉噪作对比,其他诗歌基本都是平铺直叙。整组诗中没有运用一个疑问句。就此而言,较之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“尔曹身与名俱灭,不废江河万古流”、“未及前贤更勿疑,递相祖述复先谁”,不仅没有拓展,反而是一种停滞甚至退化。

诗歌是形象的抒情艺术,不适宜说理议论。论诗绝句既然要论诗说理,就不免要多发议论,同时又要保持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性。元好问之前,唐宋诗人作了少许探索,但成功者寥寥。元好问正是在议论艺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。前文所谈的设问,就是其议论成功的一大法宝。通过设问来议论,有两大好处:一是使得议论更具锋芒和气势,观点更加鲜明突出,如前引第六首探讨文品与人品的关系,连用两个反问句,步步紧逼,使得文章不一定能反映为人的观点显得确定无疑。二是调节诗歌的节奏和声情,使得诗歌葆有咏叹的韵味。如第十首评价元稹的杜诗论:“排比铺张特一途,藩篱如此亦区区。少陵自有连城璧,争奈微之识碣砮?”全诗都是议论,除了使用比喻之外,末句的疑问“争奈”与上句“自有”、次句“亦区区”相呼应,从而增加了诗歌抑扬顿挫之致。

论诗诗中,增加议论形象性的最有效手法是比喻。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就多次用比喻:“龙文虎脊皆君驭,历块过都见尔曹。”“或看翡翠兰苕上,未掣鲸鱼碧海中。”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几乎一半诗歌运用了比喻,有时还几个比喻连用,如第二十二首:“奇外无奇更出奇,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只知诗到苏黄尽,沧海横流却是谁?”先引德诚和尚“一波才动万波随”的诗句来比喻苏诗翻新出奇的情景,再用“沧海横流”这一比喻指出了另一面,两个喻体之间如同流水一般,自然相连。如第十六首评价孟郊、李贺诗歌:“切切秋虫万古情,灯前山鬼泪纵横。”从他们的诗中提炼出“秋虫”、“山鬼”两个比喻,加上“切切”、“泪纵横”等修饰词语,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,将议论与写景、抒情结合起来。有些比喻是元好问首创,新人耳目。如他在孟郊“谁谓天地宽,一生虚自囚”^①、“万事有何味,一生虚自囚”^②的基础上,拈出“诗囚”二字概括孟郊,说“东野穷愁死不休,高天厚地一诗囚”,“诗囚”一语破的,既准确揭示出孟郊其人其诗的特征,又造语奇警,别出心裁。再比如第二十四首评价秦观诗,完全是复述其师王中立的话。王中立举秦观“有情芍药含春泪,无力蔷薇卧晓枝”两句,称其诗为“妇人语”^③,元好问将之改写为韵语:“拈出退之《山石》句,始知渠是女郎诗。”将“妇人语”替换成“女郎诗”,堪称点铁成金之笔。“妇人语”平淡无奇,“女郎诗”却新颖独到,洋溢着青春的情绪、轻快的节奏、爽朗的音调,比较符合高邮才子秦观的身份。清人吴景旭特别欣赏这一比喻,曰:“遗山论诗,直以诗作论也。抑扬讽叹,往往破的。读者息心静气以求之,得其肯会,大是谈诗一助。少游乃填词当家,其于诗场,未免踏入软红尘去。故遗山所咏,切中其病,他日又书以自警,盖知之深,言之当也。”^④此外,“布谷澜翻”、“碣砮”、“鬼画符”、“秋虫”、“山鬼”等比喻也许不无偏激之处,但感情强烈,一针见血,个性突出,很好地凸显了议论的形象性。

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也运用了比喻来加强议论的文学性,他所用的比喻有:

古今胸次浩江河,才比诸公十倍过。(其二)

近日不闻秋鹤唳,乱蝉无数噪斜阳。(其六)

欲参诗律似参禅,妙趣不由文字传。(其七)

押得韵来如砥柱,动移不得见工夫。(其九)

玉经雕琢方成器,句要丰腴字要安。(其十)

十首诗中半数用了比喻,足见戴复古对比喻的重视。其中第六首所用比喻最为形象,褒贬分明。遗憾的是,

① 《赠崔纯亮》,《孟东野诗集》卷六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,第101页。

② 《冬日》,《孟东野诗集》卷三,第47页。

③ 元好问《中州集》卷九《拟栩先生王中立》,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473页。

④ 吴景旭《历代诗话》卷六四,中华书局1958年版,第967页。

其他比喻太过寻常随意，效果欠佳，总体水平远不及元好问。

在发掘论诗绝句潜能方面，元好问还有其他独特的开拓。也许受宋诗好化用前人诗句的影响，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大量化用、挪用前人的诗句，有的与前代诗人的用法一致，如“一波才动万波随”、“岸夹桃花锦浪生”、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之类，这种引用不是论诗诗的特点所在。论诗诗引用前人诗句的独特性在于，它是出于论诗的资料需要。如第二十四首直接引用秦观“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晓枝”作为评论对象，同时也将秦观诗的境界移植到诗中，增强了这首诗的形象性。第十二首“望帝春心托杜鹃，佳人锦瑟怨华年”，上句引用李商隐《锦瑟》的成句，下句则是改写《锦瑟》的首联，并化用杜诗“暂醉佳人锦瑟旁”（《曲江对雨》），既概括了《锦瑟》诗“怨华年”的主题，又不动声色地将杜诗中的温柔遐想带入论诗诗中。第十五首评价李白，则化用李白《望庐山瀑布水》诗，将“银河落九天”置于“笔底”，用来形容其诗歌才华，高明而形象。

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正是大量运用对比、设问、比喻、引用等手法，成功克服了论诗绝句先天性的体制局限，大大发挥了论诗绝句的潜能，从而使得《论诗三十首》超越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，成了后代广泛效仿的对象。而戴复古的《论诗十绝》在论诗绝句的体制、潜能方面无甚作为，他对后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严羽《沧浪诗话》对其观点的吸收^①，其他方面则很微弱。清代论诗绝句创作繁盛，仿元之作可谓连篇累牍，如王士禛《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》三十五首、袁枚《仿元遗山论诗》三十首、谢启昆《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》等等，难以枚举，尽管他们论诗内容有所拓展，诗学旨趣有所不同，但体制上都是沿袭元好问的论诗传统，没有作出特别引人注目的突破。

〔作者简介〕胡传志，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。发表过专著《金代文学研究》等。

^① 张继定《严羽戴复古异同论》，《浙江师大学报》2001年第5期。